

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张连红

内容提要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心灵与肉体的巨大创伤。战后，由于国际形势等诸因素的影响，南京大屠杀被深深地埋在南京人的记忆之中。80年代之后，日本右派势力的日益嚣张与广泛关注，南京大屠杀从记忆和尘封的历史中走出。对60余年前南京大屠杀的主动与被动记忆，这本身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去思考的课题。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心理影响 记忆与现实

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副教授 210097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军队施加于平民的暴行事件，它对受害者（严格来说当时的南京市民均为日军暴行的受害者）精神与肉体的创伤既深且巨，本文试图通过一些历史资料和笔者对近100名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及目击者的社会调查，来探讨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南京市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战争来临与南京市民的社会心理

南京市民真正感受到战争恐怖是从1937年8月15日日机空袭开始的。空袭不仅给南京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而更为严重的是其对市民心理安全感的冲击。据日军总部发表的公告称：从8月15日至12月13日南京攻陷，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50多次，参加空袭的飞机达800架，投下炸弹160多吨。但有许多资料显示日机对南京的轰炸实际上却在110次以上。如果将那些拉了防空警报但日机并未飞临南京上空的次数算上，则南京市民在每个晴天几乎要受到3次以上空袭或空袭的威胁。报刊几乎每一天都在报道空袭中的伤亡人数和被炸后的惨景，如8月27日凌晨1时至3时日机两次飞临南京上空，炸毁民房四五百间，炸死平民百余人，炸伤数百人。四处开花的重型炸弹，再加上报刊对空袭惨景连续不断的渲染报道，更增添了市民对战争的恐惧。

日机接连不断的空袭，许多市民不堪忍受。到8月底，许多市民为躲避战火相继逃离南京，一些家境比较富裕的人大都坐船向长江上游的内地“跑反”，一些家境不富的人则向苏北、皖北等地投奔亲朋，一些很贫穷的人则计划在日军要打进南京时，再逃到郊区农村暂时躲避。因此，到了11月下旬，逃离南京者还是很多的。据档案资料记载，战前南京人口为100余万，而到了11月份只剩下50余万。

由于市内人口剧减一半，街头已少有行人。许多空房任人居住，各房东均自动停止收取房租，生活用品供过于求，价格普遍走低。如《新民报》专门刊登南京牧场消毒牛奶大减价、白报纸、油墨减价出让等广告。市内商店也大多关闭，太平路一带开业者不过四分之一，较大饭店则全部歇业。但有一些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开业的旅馆业，其生意则异常火爆，如“酒馆业中山北路之岭南酒家、中央商场之厚德福、夫子庙之别有天等则仍照常开门，多数不怕死而好吃之客人趋之若鹜。”与往年相比，进入9月初，南京订婚和结婚的人也突然增加了很多，许多报刊上登满了结婚启事的广告，一些征婚广告甚至也在大报如《新民报》上刊登，如9月10日该报刊登了顾谦吉和范映霞的结婚启事。据当时频频参加婚宴的金女大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女士称：结婚人员突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许多家长都给已订了婚的女提早婚期，让他们安安全全地完婚，以免日军来了发生意外。”

持续的空袭、报纸对南京防守能力强大的宣传以及市民的侥幸心理，使得大多数留在南京的市民在经历了空袭初期的慌张恐惧之后，对日机的空袭逐渐感到习以为常，“南京的居民，现在是那么的习惯于日本飞机的空袭了。几乎是每天，当四周响起了防空警号时，他们便都满不在乎地躲入防空壕和地窟去，毫无慌张之象。”侧日本特务人员的报告中也称：“一般市民已习惯空袭，面无愧色，态度冷静。”但对于平民来说，战争毕竟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件，在双方交战期间，四处开花的炸弹、子弹并不去分别谁是军人和谁是平民。因此，随着 11 月中旬国民政府的迁都、机关人员的撤退、日军即将攻占南京屠城的传言、有关日军残暴的传说、沪宁线难民的涌入、大多数在南京居住工作的外国人的撤离等等，市民对战争的恐怖心理开始与日俱增。在大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心神不定寻找“安全”的人，“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搬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

在南京市民最为恐慌的时候，留京外国人士决定依照上海南市难民区，组成国际安全区，以收容难民。12 月 4 日，有一些难民开始陆续搬进安全区。8 日，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正式发布《告南京市民书》：“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11 日，《拉贝日记》载：“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在 12 日晚上，许多难民都躲在拉贝的家中，”办公室安置了 30 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安置了 3 个人，有 8 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 100 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由西方人士组织的安全区成为南京难民首选的避难场所。

南京大屠杀期间恐怖不堪的难民

日军在攻打南京和占领南京之初实施的是一种威慑战，试图从心理上彻底击跨南京市民的心理防线，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惧感，使市民失去心理平衡，望而生畏，从而丧失反抗的意志。近卫声称：一切恐怖手段和毁灭性暴行的目的在于“把中国人民打得屈膝投降，在于摧毁他们的意志。”本来，“许多本地居民在日军进城后曾由衷地表示宽慰，因为显然结束了战争状况与随时发生空袭的恐怖。”但是日军进城后，其对市民无差别周而复始的虐杀和奸淫，很快击碎了难民侥幸之梦，全城难民立即陷入恐怖之中。

惊慌失措的难民纷纷寻求自保之道，原先呆在家中的难民开始潮水般地涌向由西方人开设的安全区。除了西方人管理的难民所外，绝大多数难民都佩戴太阳臂章，手中拿着太阳旗上；几乎每一个青年妇女，脸上都抹满锅灰，穿着破旧臃肿的衣服，竭力将自己打扮得又脏又丑又老，有些女孩子则将自己的头发理短，以充当男孩。在接受笔者采访所有女性幸存者中，每个人都有此经历。今年 82 岁的丁荣声老人告诉笔者，当时她躲在金女大难民营中，有一个多月都未敢洗一次脸。还有许多妇女“避免万一计，很多在大腿上贴起很多膏药，令兽兵一见而生畏，果然起先很生效，后也不行了。”

面对残暴无比的日军，在死亡危险面前，难民几乎丧失了理智，而不能正常思维，很少有人反抗，他们几乎都在等待着死亡的到来。《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刚在《朝日新闻》南京支局就曾亲眼目睹一二百中国人十分麻木地等待五人一组的被刺杀。当一、二名日军在众多男性难民面前强奸妇女甚至是自己亲人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男人们很少去反抗，女人们也大多不敢抗拒叫。正义在邪恶面前却成为弱者，人性在恐怖中受到无情扭曲。

经历了日军的残暴之后，南京难民的心理防线十分脆弱，一旦听到日本兵的皮靴声就感到异常紧张害怕圈。1938 年 1 月 1 日，伪自治会在鼓楼召开成立大会时，被逼参加庆祝成立大会的难民齐集在鼓楼广场，当广场突然放起鞭炮时，许多难民以为日军开枪了，立即趴倒在地上，直到放完后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尽管日军做了大量宣传，但大多数难民已根本不再相信日本人。当日军想找一些苦力时，难民无一不担心可能是被送到什么地方去枪毙，为日本人做苦力的人则尽一切可能寻找机会逃跑。

日军对难民的屠杀、奸淫愈残暴，难民对国民政府军的期待则愈益迫切。一个传说、一幅标语、夜里一阵激烈的枪声等都会产生无数带有充满希望想象的传说。1938 年 1 月 5 日蒋公谷的日记载：“近日我游击队逼近城垣，攻击甚烈，晚间必能听到炮声。我们在这百无聊赖之际，常往后院侧听炮声的大小，以估计游击队的远近，取为谈资，以作慰藉。有时甚至会由此引起

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行动。如1月8日，城内“盛传中国军队已进城门，准备收复南京，一些在日本使馆洗衣的妇女都抱着大堆小堆东西回家了。他们到金大时，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说日本人已离开使馆，这些妇女抢了他们的东西回来了。很快，一群妇女爬过使馆四周带刺的铁丝笼篱笆，试图抢劫。”

国民政府守军的溃败，使得困在城内的难民唯一的希望寄托于留在南京的20几个西方人士身上。一些西方人士的住宅及公司成为难民躲避的最佳选择，像金大、金女大这两个学校在最高峰时，分别涌进3万和1万多名难民，甚至连日本军人自己也认为金女大比较安全，如1938年1月20日，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因为自己要调出南京，就跑到金女大要求明妮·魏特琳收容他20岁的中国女友及其女友14岁的妹妹。在难民眼中，西方人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救星”。“外国几位先生，每到一处，一般难民齐围上来，好象小鸟见了他的母亲一样。”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中国的老百姓看到西方人时，都会蔑称他们为“洋鬼子”，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其之后，人们从内心里真正地改变了这一称呼，如对魏特琳、拉贝等都称之为“菩萨”。2月17日，魏特琳在金女院为拉贝先生举行了告别茶会，当金女大难民所的难民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后，有2、3千人聚集在大草坪跪着在大哭，乞求拉贝留下。在日军宣布要解散难民营的时候，数千名妇女跪在我们面前，许多人发誓宁愿死在难民营，也不愿回家被日军强奸、杀死。别日本人曾试图让中国人“矫正依靠欧美的观念”，但结果，日本人发现“中国人依赖欧美人的思想至今犹存。”国甚至伪政权中的中国警察看到西方人士时，都要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敬礼。

安民后南京难民的生活心理障碍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惨无人道的残暴行为，给南京市民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市民心中充满了无穷的恐惧。当时劫后余生的市民往往白天聚集在街上某一个地方，因为他们感觉到只有这样才更为安全。在采访过程中，许多被采访者都称他们当时大白天就跑到一些人很多的地方，到了晚上才敢回家睡觉。在“安民”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南京街头很难见到单独行走的年青妇女，除非是老妇人。在日本人统治期间，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紧张和恐怖之中，进出城门时，稍不小心就会被罚跪。在接受笔者采访的男性幸存者中，几乎所有人都曾受过日本兵或日本商人（南京人称为商家鬼子）的体罚。

日军持续6个星期的烧杀淫掠，也造成南京社会家庭结构的极大破坏，市民生活日益艰难。据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史迈士（晚初5.5.C.511州he）1938年的社会调查，留在南京的人家中有11.7%，也就是5500户人家成为“不完全”户，而巨这些不完全户中在南京城里平均有26%的户主是妇女，在难民营中这一比例则高达35%。调查还显示，在1938年3月份，全市就业人数只占总人数的9%。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家庭达到94%。另外，日本驻南京部队仍不断霸占市民房产，如1938年日军占房4000多间，受害人数达7617人；1939年日军田中（友）部队、三宅部队、平木部队又占用土地3316亩，受害户数1463户。日本人对南京房产的霸占及对经济的统制，更使市民生活雪上加霜。

在日本人统治期间，被国民政府下决心取缔的妓院和烟馆等却被日本人大肆推广。日本人在南京开设了许多专供日军士兵服务的慰安所，官方报纸也为妓院刊载了吸收顾客的大幅广告。据笔者调查所知，日本人在南京公开开设慰安所多达40余所，这对注重传统礼仪、对性十分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公开展示“淫秽”的举动无疑“有伤风化”，“令每个有教养的中人作呕”阔。另外，“在日本人到达以前，南京与其他国民党政府曾把贩卖毒品定为死刑，但在日本人占领的一年内，鸦片烟馆沿着扬子江岸如同芦苇一般到处萌生起来。”“被称为苦力的中国劳工，年龄从10岁到30岁，常被付给海洛因纸烟作为工钱。”据贝德士（M. s. Bates）1938年的调查，当时在南京公开经营的烟馆有175家，另有30家出售鸦片的烟店。保守统计吸食人员达5万人，相当于当时南京人口的八分之一。仅在从金女大到南门去的一条街上，就有12家卖“官土”的烟馆。妓院和烟馆是日本人进行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会给日本人带来重要财源，而其更为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诱使殖民地的民众丧失进取之心和抵抗意志。

尽管日本人表面很强大，但大多数市民都认为日本人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十分鄙视和痛恨那些充当日本人打手的二鬼子，甚至参加了伪政权的人也常常流露出自卑心态，据德国外交官罗森观察，他在“从同日本同行谈话中了解到的情况，南京新政府已不再被人瞧得起。它在同日本人交往方面也有困难，特别在为居民提供食品这一变得十分严重的问题上有困难。”“列一些在南

大屠杀期间遭到日本兵强奸的妇女，在得知自己不幸怀孕后纷纷迫不及待地到医院或采取其它措施进行流产。在市民眼中日本人在南京的统治是“猴子的尾巴长不了”。

日本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对南京人伤害实在太深，而安民后的高压毒化统治和无情掠夺更让南京人憎恨不已。1939 年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曾对 80 个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教育程度的南京市民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其结果得出“在未来的 50 年中这个地区的人民决不会相信任何有利于日本的词语。日军的所作所为对每个家庭——包括那些为了不致饿死而在傀儡政府工作的人——的生活伤害得太深了。”魏特琳女士也称：金女大附近邻居中 9 人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人有一句好话，他们都深深痛恨日本人。”

挥之不去的南京大屠杀阴影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投降，南京市民终于迎来了光复的一天，但市民准备殴打日本人的报复行动却被国民政府“以德报怨”政策所取代。1949 年之后，中国受到美英等国的遏制，美英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敌人，其后一切政治运动都围绕着揭露美英帝国主义者的罪行而开展。给南京市民造成巨大创伤的南京大屠杀却被深深地埋在南京人的记忆之中。

但是，80 年代日本教科书事件之后，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日益猖獗，日本右派的言行导致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又重新得到南京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以此为专题研究的民间团体和学术机构相继建立，1985 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开放，每年 12 月 13 日 10 时南京为死者和生者拉警报和鸣笛，新闻舆论对教科书事件、东史郎事件、拉贝日记、李秀英事件等进行广泛报道，这一切使得记忆中的南京大屠杀又成了现实生活里的重要话题。针对东史郎诉讼案，笔者曾组织一次社会调查，发现近 89% 和 84% 的南京人了解和表示继续关注东史郎案网。

南京大屠杀由历史走向现实，是历史与时代的不幸，这对经历过南京大屠杀劫难之后而幸存的老人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无情的摧残。对于那些因日军大屠杀而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妻子的丈夫、失去子女的父母和成千上万被日本兵糟蹋后心中永留伤疤的妇女以及被日军强迫乱伦的家庭来说，80 年代以来日本右派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无疑是在一次次地揭开他们那永难痊愈的伤疤。在受害者心目中，现在的日本右派比当年施暴的日本兵还要可恶。有的老人每当从媒体中听到和看到日本右派的言行后，经常几夜都睡不着觉，60 多年前的日本兵的皮鞋声仿佛又在耳边不停地响起，她们似乎又感受到了印多年前的悲剧又要重演。今年已 74 岁的孟秀英老人在接受笔者采访之后，则千叮万嘱不要暴露她的姓名和照片，因为她竟然还担心日本人会来暗杀她回。对于老一代南京人而言，日本人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对他们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据不完全统计调查，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老人现在尚有 2630 余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一般认为老年人对遥远的过去，即自己年轻时所发生的事件记得很清楚”，而对那些亲身经历过身体或心灵遭受过巨大创伤的事，老人的回忆往往则更加清楚，很难遗忘。他们经常坐在阳光下闲谈，在家中则经常唠叨给他们的子女和第三代，或者讲述给左邻右舍的人听。在笔者调查的过程中，老人们共同的话语都是日本人残暴而又缺德，几乎所有老人对日本没有丝毫好感，他们拒用日货，因为每一件日货都会刺伤他的心。经历过南京大屠杀或日军统治的老年人，其观点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果现在一个西方人在中国对中国人有不礼貌行为也许不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但是如果是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冒犯了中国人，则一定会引起轩然大波。

现今有远见的日本人在抚慰亡者和生者的心，而有些日本人则在千方百计想用浓墨涂改血迹，用不负责任的谎言来取代历史的事实。我们应从悲惨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不应使之成为仇恨的催化剂。日本政府应对战争责任进行彻底反省，时间拖延越长，南京大屠杀的阴影就会越重，日本背负的包袱将会越沉，其付出的代价亦必然更大！